

比较诗学、认知诗学与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

王 宁

内容提要：“世界文学”近年来已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当年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颇受启发故提出了这一构想。本文作者在西方学者的先期研究基础上，从比较的和中国的视角提出一种世界诗学的理论建构。作者认为，世界诗学的建构有着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基础，此外，近几年来认知诗学的异军突起和日臻成熟，也为我们建构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或世界诗学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建构世界诗学的理论根据主要有这三点：（1）世界诗学是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理论升华，而当今占据主流的西方文论并未涵盖不同国别和民族的文学和理论经验；（2）迄今所有具有相对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都产生于西方语境，由于其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局限，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将其涵盖东西方文学和理论的范畴和经验，尽管一些理论家凭着深厚的学养和理论把握能力通过强制性阐释使自己的理论教义也能用于非西方文学阐释，但毕竟漏洞很多；（3）中国学者始终关注西方文学理论的前沿课题，同时又有东方的本土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因此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提出这一理论建构。作者在对建构世界诗学的路径加以阐释后指出，世界诗学构想的提出，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概念的进一步完善，它作为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且值得国际学界关注和讨论的理论话题，将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格局。

关键词：比较诗学 世界文学 世界诗学 普适性 阐释理论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 has in recent years become another heatedly discussed cutting edge theoretical topic in international humanities. Goethe first conceptualized this term a hundred and ninety years ago larg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he was inspired by some non-Western literary works he had read, including Chinese literary works. Based on the ready-made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largely from a Chinese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uts forward a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both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Besides, the newly emergent cognitive poetics which has been more and more mature has also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which

is also a sort of universal interpretive theory of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such a world poetics mainly lie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1) World poetics is a theoretical sublima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as the dominant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present era does not cover all the experiences of different 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critical theories. (2) So far almost all the relatively universal literary interpretive theories are from the West, which due to the limit of their languag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can hardly cover all the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categories and experiences. Although some Western theorists, depending upon their profound theoretical attainment and superb interpretive power, impose their theoretical doctrines upon interpreting non-Western literary phenomena, their interpretations can hardly be effective and convincing. (3) Chinese scholars are always concerned about the cutting edge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while obtaining rich local literary and critical experiences. They have full right to put forward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after explaining his way of constructing world poetics that to put forward thi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ay well help perfect world literary theory and conceptualization. As a theoretical issue set forth by Chinese scholars worth attracting their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attention, it will change and revise the established world literary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etics; world literature; world poetics; universality; interpretive theory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世界文学”这个沉寂了多年的理论概念近十多年来也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并逐渐成为国际人文学科研究的又一个热门话题。^[1]当年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这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受到很大启发故提出了这一理论构想。同样,中国的文学理论也曾对西方学者的比较诗学理论建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主流的西方文学理论家却全然不知,或者拒不承认。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刘若愚 (James J. Y. Liu, 1926—1986)、法国学者艾田浦 (René Etiemble, 1909—2002)、荷兰学者佛克马 (Douwe W. Fokkema, 1931—2011) 以及美国学者孟而康 (Earl Miner, 1927—2004) 等人则作过一些初步的尝试。孟而康这位精通东西方文学和理论比较文学学者甚至提出一种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理论模式,但是他的诗学理论并未上升到

[1] 虽然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自歌德提出其构想以来一直有所讨论,但真正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引进学界广泛关注和讨论则始自 21 世纪初,尤其是大卫·达姆罗什 (David Damrosch) 出版他的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之后这方面的著述才不断增多。

总体文学和世界文论（诗学）建构的高度。^[2]其原因在于，在当时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非西方的文学和批评理论经验并未被当作建构一种普适性世界文论的基础。而在今天世界文学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审美现实的情况下，文学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关于“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情势我已在多个场合做过讨论，也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著述，这里无须赘言。^[3]我在此提出一种世界诗学建构之前想再次强调，“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使得一些原先被压抑在边缘的理论话语得以步入前台，目前在国内被人们热议的认知诗学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得来自小民族的或非西方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研究者得以与我们的西方乃至国际同行在同一个层次上进行平等的对话。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世界文学和比较诗学这两个概念建构一种同样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这也可算作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的一个尝试。

从比较诗学、认知诗学到世界诗学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当今时代，由于文化研究的冲击，谈论具有精英意识和含有诸多审美元素的诗学早已被认为是一种奢侈品。即使在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比较诗学问题也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进行，而且还要与当下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相关联。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的情形下，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哀叹：文学创作面临着死亡的境地，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也早就演变成了漫无边际的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既然如此，谈论比较诗学还有何意义？在当今这个精英文学呈萎缩情势的状况下讨论诗学问题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但我认为，上述这些情况只是西方文论界的情形，并不代表整个世界的文学理论状况。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学理论界，经过近百年来的学习西方理论和弘扬比较文学，再加之近几年来世界文学理念和认知诗学的引进和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已经娴熟地掌握了西方文论建构的路径和方法，此外，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文论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实践，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建构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话语并在国际学界发出强劲声音的时候了。

[2] 他在这方面的一部集大成之著作就是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的专著：*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参阅我的著作：《“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论文：《“后理论时代”的文化理论》，《文景》，2005年第3期；《“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穿越“理论”之间：“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思潮和文化建构》，台湾《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32期（2007年10月）；《“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国际化走向和理论建构》，《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再论“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态势及走向》，《学术月刊》，2013年第5期；以及《“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毫无疑问,要想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或曰世界诗学,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建构是否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否则的话,即使建构出了一种宏大的理论体系,也未必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因此我们要通过对中国和西方以及东方主要国家的诗学的比较研究,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否则重复前人或外国人早已做过的事情绝不可能取得绝对意义上的创新。因此我认为,这个基础就是在国际比较文学领域内存在已久的分支学科——比较诗学,而本文则首先从比较诗学的视角切入来探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理论的可比性和综合性。通过这种比较和分析,我们透过各民族/国别诗学或文论的差异之表面窥见其中的一些共性和相通之处,这样建构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有了合法性和可行性的基础。当然,建构世界诗学有着不同的路径,它具体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世界诗学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2)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更应该重视世界其他地方用其他语言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3)世界诗学必须是一种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学阐释理论,它应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和理论现象;(4)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到普适性与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应当向取自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批评经验的所有理论开放,尤其应该关注来自小民族但确实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文学和理论;(5)世界诗学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在运用于文学阐释时绝不可对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强制性阐释”,而更应该聚焦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实践,并及时地对自身的理论模式进行修正和完善;(6)世界诗学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理论话语体系,它应能与人文学科的其他分支学科领域进行对话,并对人文科学理论话语的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7)世界诗学应该具有可译性,以便能够对英语世界或西方语境之外的文学作品和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同时在被翻译的过程中它自身也应有所获益;(8)任何一种阐释理论,只要能够用于世界文学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就可跻身世界诗学,因此世界诗学也如同世界文学概念一样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的状态;(9)世界诗学既然是可以建构的,那它也应处于一种不断地被重构的动态模式,那种自我封闭但却无法经过重构的诗学理论是不可能成为世界诗学的,因此每一代文学理论家都可以在实际运用中对它进行质疑、修正甚至重构。总之,我们提出世界诗学构想和理论建构,必然使得居于比较诗学层面的来自不同民族/国别的诗学具有一种整体的视野和理论的高度,同时也有助于世界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它也将如同世界文学这个理论概念一样,作为一个能够引发讨论甚至争论的理论话题产生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修正现有的世界文学和文论的格局。此外,作为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

学研究者，我们也可以借此从中国的视角对重新绘制世界文学和文论的版图作出自己的贡献。

确实，在当前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尽管有相当一部分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讨论，但却很少有人去深入探讨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这些学者也并不企望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4]另一方面，世界文学伴随着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大的论题的再度出现，已经变得越来越吸引东西方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一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也参与讨论并且提出了关于这一颇有争议的概念的各种定义和描述。同样，不少学者已经试图将世界文学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以及重写文学史等论题相结合，以便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迄今所取得的成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在于至今尚无人提出自己的全新理论建构。对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也依然停留在比较诗学的层面，并没有在孟而康的比较诗学研究基础上做出理论上的升华和建构。因此在提出我的理论建构之前，简略地回顾一下孟而康的比较诗学概念和他已经做出的开拓性工作仍有必要。因为在我看来，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主导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那些年代里，孟而康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跨东西方文学和理论比较研究的路径，并且颇有洞见地提出了“跨文化的比较诗学研究”，应该说，他的具有“拓荒”性质的先期研究及其成果给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确实，孟而康的研究基于跨东西方文学和理论比较研究，他通过仔细阅读，从东西方文学和理论著作中积累了大量的例证，从而发现了“一种生成性诗学”，^[5]虽然他并没有使用诸如“世界”（world）或“普世的”（universal）这类词，但他实际上意在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或者所谓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建立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体系。因为在他看来，这样一种普遍的或系统性的诗学首先应当是“自满自足的”，不应该受制于特定的时代和批评风尚的嬗变，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意义和价值的美学原则。显然，孟而康集中讨论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作品，但却

[4] 西方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著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要有：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o D'haen, *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2012;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d Damrosch,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9;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 54-68. 这些著述大都围绕世界文学这个话题进行构想（Moretti）、讨论（Damrosch）、争论（Apter）并总结（D'haen），但是都没有涉及世界诗学或文学理论问题。

[5]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札记》，王宇根、宋伟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译文有所校改。

很少讨论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因此,我们今天在建构一种世界诗学时,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虽然它对我的理论建构不无启发,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少。另一方面,孟而康著作的局限还在于,他出版了《比较诗学》一书后不久就患病,由于他的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他已经开始萌发的世界诗学构想,这无疑给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6]再者,他的另一个局限则在于,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头脑里考虑最多的是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文论,虽然他在书中也捎带提及了中国的文学理论著作,但却全然不提现代文论。因此他的研究更具有史学的价值而并不能引发当下的理论讨论。因此后来在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并迅速步入学术前沿时,比较诗学便逐步被“边缘化”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孟而康出版《比较诗学》的90年代初,正是文化研究崛起并对比较文学学科产生强有力冲击的年代,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更是言必称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反对传统的习俗,挑战精英意识,以当代非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为研究对象,这就更与有着精英和经典意识并排斥当代文论的比较诗学大相径庭,因此比较诗学研究很快就被淹没在文化研究的“众声喧哗”声中,它只能在一个狭窄的小圈子里发挥有限的功能和影响。而比较诗学虽然仍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但它已经被东西方的文学批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是不甚完备的。在当今这个跨文化的语境下它很难显示出其普适意义和价值,因此建构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世界诗学就势在必行。

此外,我所提出的世界诗学建构,还受到其他一些理论建构的启迪,其中之一就是在当今时代异军突起并且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的认知诗学。我认为这也是作为我提出自己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因为在我看来,提出世界诗学的建构,如果没有广泛深入地对中外诗学或文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就如同一座空中楼阁那样不攻自垮。而认知诗学则是近十多年来从边缘逐步进入中心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介入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界面研究,专注文学的语言因素考察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证性。它提醒人们,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对它的研究就不可能忽视从语言形式入手的经验研究。因此认知诗学的崛起实际上起到了文化理论衰落之后的某种反拨作用。它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兴盛更是说明了这种理论模式的普适性和可行性。本文的目的并非专门讨论比较诗学和认知诗学,但这二者在我的理论建构中却是无法回避的。它们对我的启迪也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从比较诗学谈起。比较诗学 (comparative poetics) 质言之,就是从比较的视

[6] 关于孟而康的比较诗学价值以及理论建构上的局限, Cf. Wang Ning,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 Poetics", *Neohelicon*, 41.2 (2014), pp. 415-426.

角对文学理论进行的研究，它聚焦于文学理论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的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既包括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诗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包括了跨学科、跨文化诗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比较诗学并不意味着仅仅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理论，它还可以将文学的理论阐释作为其观照的对象，因此它同时也是诗学的一个分支。而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则是近几年来十分活跃的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它将认知科学的原则，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原则，用于文学文本的阐释。它与读者反应批评，尤其是注重读者的心理反应作用的那一派，密切相关，此外，它也与专注文学的语言界面研究的文体学关系密切，常常被欧洲的一些崇尚文学经验研究的学者用来分析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认知诗学批评家也像当年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那样，致力于文学文本的细读和分析。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认知诗学批评家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语境的重要性，尤其是对文本的意义的发掘至关重要。因此认知诗学也突破了新批评派的那种封闭式的专注文本的做法，同时也超越了结构主义的专注语言形式的做法，它所显示出的强大生命力已经越来越为当代理论界所认可。

如果说，比较诗学理论家孟而康是一位来自精英文学研究的美国学者的话，那么认知诗学的奠基人是鲁文·楚尔(Reuven Tsur)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来自小民族和小语种的理论家，他所出生的国家是东欧的罗马尼亚，远离西欧的文学理论主流，所操持的母语更是不入主流。后来他所工作的国家以色列也是一个远离欧美中心但却与欧美学界有着密切关系的边缘地带。楚尔在写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中发展了一种被他称之为“认知诗学”的方法，试图将其推广到所有的文学和诗学研究中。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认知诗学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文学理论、语言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多个分支。就文学研究而言，认知诗学探讨的是文本的结构与人类感知性之间的关系，并对发生在人的大脑里的各种作用充当协调者。楚尔的贡献就在于将这种认知诗学加以推广并应用于格律、声音的象征、诗歌的节奏、隐喻、诗歌本身以及变化了的意识状态的研究，他从探讨文学的“文学性”乃至“诗性”入手，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他所建构的认知诗学还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诸如时期的风格、文类、建筑范式、翻译理论、批评家的隐含的确定风格、批评能力以及文学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的特性。当然这种美好的愿景能否在实际文学阅读和批评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运用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楚尔对理论建构的热情和雄心确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但是，认知诗学为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得不到彰显呢？这显然与两方面的制约有关：首先是在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一切专注文学文本的语言因素考察研究的批评和阐释都被边缘化了，认知诗学也是如此。其次则是在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一个来自小民族和小语种的学者尽管用西方的霸权语言——英语发表著述，但依然很难跻身学术理论争鸣的前沿。而在当今的“后理论时代”，文

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化批评的批判锋芒有所锐减,文学研究再度收复一些失地,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更加注重文学的经验研究,这显然为认知诗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我在提出我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时,之所以要提及认知诗学,其原因有两个:其一,作为对大而无当的文化理论的一种反拨,认知诗学依然专注文学文本,并注重文学的语言因素,因而与诗学的关注对象比较接近;其二,既然鲁文·楚尔被认为是认知诗学的奠基人,那么他的双重边缘身份也值得我们重视,他的出身背景(罗马尼亚)和工作环境(以色列)都是典型的小民族。但是他却有着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敢于采用世界通行的语言——英语作为写作的媒介,通过英语的影响力和流通渠道把自己的理论建构传播出去,这无疑对我们中国学者的理论建构是一种启示。正是这一来自小民族的边缘地区的理论可以在当今这个“后理论时代”从边缘走向中心,经过英语世界的中介又对汉语世界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也是我在提出世界诗学理论建构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启示。

世界诗学的构想和理论建构

如前所述,本文的重点是要提出我的世界诗学理论建构,^[7]当然,由于本文篇幅所限,我不可能全面地阐释我所要建构的世界诗学的内容,但我想先在本文中提出这一构想并对之进行论证,以便在今后的著述中逐步加以拓展和完善。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提出世界诗学或世界文论这一理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宏大叙事”已失去魅力的“微时代”,理论建构还能起到何种作用?诚然,我的目的就在于建构一种有着共同美学原则和普适标准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当然,也许人们会问,既然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化千姿百态,能有一个普世公认的审美标准吗?我的回答既是否定的同时又是肯定的:在绝对意义上说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依循一种相对普适的审美标准来进行理论建构还是可以做到的。世界文学的建构就是如此。190年前,当歌德在阅读了一些非西方文学作品后发现了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一些共同和共通的因素,他指出:“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所有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现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它早日来临。”^[8]当歌德提出这一理论构想时几乎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假想,尽管歌德从表面上看来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桎梏,但他同时却又陷入了德意

[7] 关于世界诗学的初步构想,参阅拙作:《世界诗学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169-176页。

[8] 引自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

志中心主义的陷阱，认为德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提到“世界的文学”概念时才将其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和文化的全球化特征联系起来。^[9] 在后来一段漫长的时间里，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世界主义的理念被放逐到了边缘，尽管一些有着比较意识和国际视野的文学研究者大力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但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依然缺乏一个整体的和世界文学的视野，正如意大利裔美国学者弗兰科·莫瑞提（Franco Moretti）所讥讽的：“比较文学并没有实现这些开放的思想的初衷，它一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知识事业，基本上局限于西欧，至多沿着莱茵河畔（专攻法国文学的德语文学研究者）发展，也不过仅此而已。”^[10] 我们今天提出世界诗学的建构也应吸取这一历史的教训，切忌故步自封和唯我独尊，也不能将世界诗学建构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有限扩展版。因此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世界诗学或文论不能是简单地来自西方文学，也不能主要地来自东方文学，更不能是东西方文学和文论的简单相加。它应该是一种全新的文学阐释理论，应该是经过东西方文学批评和阐释的实践考验切实可行的理论概念的提炼和抽象，应该在对优秀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的扎实研究之基础上加以建构，这样它才有可能被用于有效地解释所有的东西方文学现象。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超越前人未竟的事业所应做的工作。下面我从九个方面详细阐述世界诗学建构的内容。

首先，世界诗学必须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包容产生自全世界主要语言文化土壤的文学理论，因此对它的表达就应该同时是作为整体的诗学体系和作为具体的文学阐释理论。既然世界诗学意指全世界各民族最优秀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那么它就应该像世界文学那样，同时以单数和复数的形式来加以表述。我想将其用于建构这样一种世界诗学也同样适用。由于“诗学”（poetics）这一术语在英文中无法区分其单复数形式，我这里便使用“文学理论”来加以表述：作为总体的世界文论（world literary theory）和具体的世界（各民族/国别的）文论（world literary theories）。前者指这样一种总体的世界文论所具有的普适性意义的很高的审美标准，也即它应该是世界优秀的文学理论的提炼升华之结晶，后者则应考虑到来自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的具体文论和范畴。但是那些能够被视为世界诗学的理论必定符合普适性的高标准，必须可用于解释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出现的所有现象。因此，仅仅基于某个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论经验而建构的理论如果不能在另一个民族/国别的文学研究中得到应用或推广就算不上世界性的诗学或理论。

其次，世界诗学必须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界限，不能只是“英语中心主义”的产物，而应重视用其他语言撰写并发表的文学理论著述的作用和经验，并且及时地将其合理的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0页。

[10] Franco Moretti,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 54.

因素融入建构中的世界诗学体系,这样建构出来的世界诗学便具有了跨越语言和文化之界限的特征。我们都知道,西方文化传统中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来的历代理论家发展完善起来的诗学理论就经历了不断的重构,它在用于东方文学作品和现象的阐释时也被“东方化”进而具有了更多的普适意义和价值。而相比之下,在英语世界出版的几乎所有讨论文学理论史的主要著作中,非西方国家的文学理论或者受到全然忽略,或者简单地被稍加提及,根本没有占据应有的篇幅。尽管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自满自足的诗学体系,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但迄今为止西方的主要理论家几乎对此全然不知,即使在孟而康的名为《比较诗学》的专著中对之也很少提及。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则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概念颇为熟悉,并能娴熟自如运用西方文论的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文学和理论现象。即使是那些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者若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至少是不能登上大学讲台讲授文学理论课的。这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微不足道的知识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对中国以及东方诗学的忽略和不屑一顾显然是探讨世界文论或诗学过程中的一个严重缺陷。作为一位中国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我所要强调指出的就是,编撰一部完整的世界文论史或诗学史应该包括符合这一标准的主要非西方文论著作,尤其是像《文心雕龙》这样一部博大精深的文论著作,更是不应该被排斥在世界诗学经典之外。

第三,世界诗学既然被认为是一种普适性的文学阐释理论,那么它就应能用于解释所有的世界文学和理论现象,而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古代的还是现当代的文学现象。实际上,长期以来,东方文化和文学对来自西方的理论一直持一种包容的和“拿来主义”的态度,一些东方国家的学者甚至对来自西方的文学理论顶礼膜拜,在自己的著述中言必称西方文论,而对自己国家的文学理论则远没有达到这种推崇的地步。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明显。确实,自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日本和印度的比较文学学者早就自觉地开始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民族/国别文学和理论现象,他们在用以解释自己的文学现象的过程中,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使得原来有着民族和地域局限的西方理论具有了“全球的”(global)特征和普世的意义,而在许多情况下则在与当地的文学实践的碰撞和对话中打上了“全球本土的”(glocal)印记。但在那些西方国家,即使是在汉学家中,文学研究者仍然一直在沿用从西方的文学经验或文化传统中得出的理论概念来解释非西方的文学现象,例如在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现象就显而易见。既然我们要建构一种世界性的诗学理论,我们就应该努力克服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尽可能多地包容产生自各民族和各种文化土壤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理论范畴和概念,使之上升到世界诗学的高度,否则一部世界诗学史就会变成西方诗学的有限的扩展版。

第四,建构世界诗学应同时考虑到普世性与相对性的结合,也即它应当向取自民